

林伦伦 主编

南方民族研究

秦汉时，相关史籍泛称中国南方的民族为「越族」，史称「北方胡，南方越」。由于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至迟在汉朝初期，百越族已经逐渐形成几个较强盛而明显的部分，这些部分都形成了当时该地的政治中心。比如说闽越第一代君主无诸，东海第一代君主驺摇，以及南越王赵佗，都曾经叱咤风云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南方民族研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南方民族研究 / 林伦伦主编. —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81135 - 504 - 8

I. ①南… II. ①林…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文化—中国—文集
IV. ①K2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1946 号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0693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邮 编: 510630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96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51 千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

定 价: 29.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在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做民族学研究，不得不先把这缘起说清楚。

海南岛曾经属于广东省管辖，是黎族的主要居住地，此外还有壮族、回族等兄弟民族，再加上粤北的瑶族和壮族、粤东的畲族，广东省曾经是少数民族大省。为了培养和培训少数民族干部人才，1957年，“广东民族学院”在广州应运而生。后来由于极“左”的教育路线的指导，该学院搬到黎族的大本营——海南岛的五指山。1977年，高考恢复了。当时的广东民族学院的领导经过艰苦的努力，直到1981年才把广东民族学院又迁回广州。这样雨里去风里来，折腾了1/4个世纪。再后来，海南岛脱离广东，独立建省，广东变成了少数民族“小”省。少数民族生源萎缩，使广东民族学院办学规模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1998年，为了满足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对技能人才和职业教育师资的迫切需要，广东民族学院改名为“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办学定位改为“面向职教，服务职教，引领职教”，并有了“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的功能不变”的附加定位。2002年，因为校名太像高职高专院校，与这所办学50多年、有20多年本科教育历史院校的身份严重不符而去掉“职业”两字，成了“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就这样，从迁回广州到现在，又是1/4个世纪。

然而，不管发展的道路是多么的崎岖，从前的广东民族学院今天的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研究少数民族、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的宗旨始终没有改变。在五指山办学期间，学院做了大量的黎族文学和文化的调查与资料收集工作。搬回广州后不久的1984年，就由广东省委宣传部正式批准，成立了广东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设立了专职研究编制，建设了专业的研究队伍，出了一批批的研究成果，在海南黎族、粤北瑶族研究方面的成果尤其丰硕。2005年，学院申报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正确地把民族学作为特色学科进行建设。结果，不仅民族学硕士点获得批准，还为学校被批准为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作出了贡献。2006年，民族研究所再接再厉，积极建设，获得了一批高档次的科研项目，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被批准成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接着，学校根据民族学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广东民族学院广大校友的呼声，成立了“民族学院”作为二级学院，2007年开始招收“民族学”本科生和研究生。2008年，与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合作，成立了广东省民族干

部培训中心和广东民族艺术团。学校的民族教育、民族艺术活动、民族学研究红红火火地搞起来了。

现在的民族学研究基地，有一支强有力的研究队伍，其中校内专职研究人员 20 多人，校内、校外兼职研究专家 20 多人。在研项目有 10 多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4 项，省部级项目 6 项。3 年来，出版专著 10 多部，在《民族研究》、《民族语文》和《民族文学研究》等民族学研究的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 50 余篇。

民族学研究基地的主要方向有三个：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南方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和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方言。为了持之以恒地开展研究工作，做出这三个方向的特色，把这三个方向的研究做强做大，我们特编辑出版《南方民族研究》和《南方民族语言研究》两种论文集刊。我们的做法是，除了基地自己的研究成果之外，广邀海内外名家和其他民族学研究的同行赐稿，每年一到两辑，一直坚持下去，把它建设成为海内外民族学研究同行发表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交流的平台及我校民族学研究基地的品牌。

竭诚欢迎海内外同行专家惠赐文稿，期待你们的批评与指正！

林伦伦

2009 年金秋时节于穗城

目 录

序	(1)
---------	-----

南方民族研究

从民族文化看海南黎族与台湾高山族同源	司徒尚纪 许桂灵 (3)
海南原始居民蠡测	陈光良 (15)

南方民族文化研究

珠江流域族群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周大鸣 (27)
粤北山区瑶族移民的文化适应	陈晓毅 马建钊 (42)
黎族几种典型传统织绣花纹图案内涵解读	黄学魁 (53)
儒家文化与瑶族传统社会及其文化之关系	李筱文 (58)
简论广东的茶文化资源	刘付靖 (66)
瑶长制与瑶族乡村治理——以平地瑶为例	李 琴 (73)
茶山瑶社会习俗述论	赵炳林 (83)
人类学视野下的黎族女巫问题	张太教 (93)
海南农村汉族春节“拜公庙”习俗调查报告	齐 爽 (104)

南方民族经济研究

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与产权合理安排	单纬东 (113)
略述光绪年间清朝对海南岛民族地区道路的开辟及其成效	赵丕强 (120)
南岭地区农业社区农业产业化问题研究	谢玉红 (125)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户脱贫的根本途径——职业技能培训	赵家旺 (135)

加快民族经济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朱宏伟 (142)
----------------------------	-----------

南方民族文学研究

跨越与局限——黎族当代作家创作简论	王海 (155)
文化遮蔽、身份认同与壮族文学史上的“冯敏昌现象”	彭静 (162)

民族文化建设

满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关纪新 (177)
论全球文化传播和交流中应遵循的几个原则	陈曦 (199)
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现状及其走向	宋卫 (205)

编后记	周建江 (214)
-----------	-----------

南方民族研究

从民族文化看海南黎族与台湾高山族同源

司徒尚纪 许桂灵

【摘要】生活在海南岛和台湾岛上的黎族和高山族同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虽然他们现在分属两个民族，且每族内部又有多个分支，但溯本追源，他们主要是从祖国大陆迁到岛上的古越族后裔，后发展为两个不同民族和支系，即同源。他们与祖国大陆和其他兄弟民族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但有深刻的地缘和史缘根据，而且在语言、风俗及地名等民族文化的各个要素和层面上，都有着异乎寻常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显示黎族和高山族的族源与文化的根源及主流，仍在祖国大陆。充分认识和肯定这种关系，对研究海南和台湾的民族历史与文化，以及他们与大陆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民族文化 黎族 高山族 同源

一、地理环境相类似，提供两岛民族文化发生共同基础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且深刻影响到一个地区或民族文化的特质与风格。海南岛和台湾岛位于中国南部和东南部，被喻为祖国的两只眼睛，面积相当，同属热带或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中间山脉高耸，河流短促，沿海平原面积狭小，土壤、生物、水文、地质构造和活动等也很相似。这是原始居民摄取食物、营造居室，以及其他为适应这种环境而采取的生产生活方式，即原始文化相同或相似的自然基础。

尤为重要的是，地史研究表明，海南和台湾都属大陆型岛屿，即原为大陆一部分，后因地壳下陷或海洋水面上升，才与大陆分离。海南岛就有过两次与大陆分合的历史，最后一次是全新世早期，距今约7 000年，海面上升，海南再次脱离大陆，成为海岛，而台湾也在这个时期最终与大陆分开，台湾海峡和琼州海峡形成^[1]。在此之前，是海平面下降时期，台湾海峡地区曾为平原或浅水区，方便大陆或南洋一些地区的原始人类往来，有可能陆行或使用独木舟进

作者简介：司徒尚纪（1943年—），男。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区域文化地理。

许桂灵（1971年—），女，广东省委党校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地理、区域发展与规划。

入两岛。据 C^{14} 测定, 作为海南、台湾与大陆和东南亚连接点及交通枢纽的南海诸岛大部分岛屿露出水面的时间距今约 5 000 年^[2], 此前因为海平面较低, 南海周边地区的原始人类与两岛交往也甚有可能。

因为海南和台湾脱离大陆的时间很短, 从生物进化的原理观察, 在一个狭小的岛屿范围里, 不可能实现从猿到人的转变, 所以岛上的最早居民不可能是土生土长的, 而应是从中国大陆或其他地区迁入的。类似事例已从两岛动物区系演化中得到验证。例如, 因为老虎的出现时间比两岛形成的时间要晚, 而老虎又不能在孤立环境下形成、发育, 所以两岛从来无虎。汉初, 登上海南汉人见岛上“亡马与虎”^[3]。台湾也有同样记载, 清雍正黄叔璥《台湾使槎录》说: “山无虎”, “故鹿、麋、獐、麂之属成群遍野, 莫为之害, 野牛最蕃滋”^[4]。这极利于畜牧业的发展, 牛羊可以野牧, 无须专人看管。明代海南“牛羊被野, 无冒诏(领)者”^[5], 台湾因无虎使平埔人打鹿业在 17 世纪十分兴旺, “社社无不饱鹿”^[6], 故两岛畜牧文化多有共同性, 而与虎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匮乏, 这不能不说是地理环境特点所致。也正因为这种类似的地理环境, 深刻影响到两岛原始文化和历史文化特征, 并在以下方面呈现出颇多共性。

二、考古发现显示黎族、高山族同源

近年考古发现显示, 在我国大陆南方、海南和台湾都发现旧石器和新石器文化。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内涵均属于大陆古越族之前的古人类和古文化, 且组成一个完整的古文化系统, 有力地证明了黎族、高山黎与大陆古越族是同一来源。

近年在海南发现多处石器文化遗址, 其中包括三亚落笔洞距今约 1 万年的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早期的石片石器, 陵水大港村、石贡、旧县坡等距今 6 000—7 000 年新石器中期的磨光石斧、石铤、砺石和各种夹砂陶器, 陵水古楼坡、文昌吕田坡、定安佳龙坡距今 3 000—5 000 年新石器晚期的双肩石斧、有段石铤、平肩长身石铲、大石铲, 以及板沿口釜、罐等器物, 还有各遗址以云雷纹、菱形纹、方格纹和米字纹等饰物为代表的战国至秦汉几何印纹陶等, 其风格与华南各省区出土的同类器物文化内涵一致, 发展变化规律也一致, 属同一个文化系统。在排除了海南具有从猿到人进化的可能性之后, 这些不同时代器物无疑主要是华南大陆古人类带到岛上或在岛上创造的。这些古人类即后来的古越人^[7]。

在台湾台南发现的古人类“左镇人”头骨化石距今约 3 万年, 与北京山顶

洞人同属旧石器晚期。又据日月潭孢粉分析,1.2万年前当地可能发生伐木和农业活动^[8]。而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遗址在台湾分布更多更广,如台北圆山、大坌坑、北部沿海土地公山、芝山岩、大直、尖山等数十处,出土有段石铤、有肩石斧、印纹陶、黑陶和彩陶等,质量和风格与大陆东南沿海地区发现的同类器物相近。另外,在台湾中部和南部沿海、河谷发现与圆山文化同时代距今约4500—3000年的凤鼻头文化各期(1~3期)的陶器、贝丘、石斧、石铤等亦与大陆东南沿海出土的同类器物有很多共性。人类学者林惠祥教授在比较以上器物后指出,台湾圆山文化是由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传播过去的,传播路径以福建较有可能,因两地距离较近,中有澎湖列岛^[9]。而进入台湾的古人类,主要应为大陆古越人。

海南、台湾新旧石器和陶器既与大陆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则说明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文化风格若有小异,应为古越族内部有不同分支所致。例如,福建为闽越,岭南为南越、骆越等,皆为古越族分支,他们进入海南和台湾,后发展为黎族和高山族及其分支,成为岛上最早的居民。

三、文化特征显示黎族和高山族同源

文化较之血统,对民族认同更为重要,而文化的个性和共性是研究民族识别和民族比较的主要标志。语言、风俗作为比较稳定、持久的文化要素,对比较黎族和高山族的文化特征更具重要意义。它们的共同性或类似性,同样说明两族渊源于大陆古越族。

1. 语言比较

黎族和高山族在迁移过程中,语言会发生变异,尤其是进入海岛后,在与汉族交流和接触的过程中,也会失去自己的一部分语言。但不管怎样,民族语言仍是语言主体,并与母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通过比较,可发现黎族和高山族语言存在颇多共性,皆以古越语为母语,后来才朝着各自方向发展,呈现出同源异流模式。

比较语言学表明,黎语和高山族使用语言(旧称“番语”)同为胶着语,有一字数音的特点,不同于汉语的一字一音,而古越语也是胶着语。如“船”,古越人称为“须虑”^[10]。古越语后随民族迁移发展为不同分支,但作为底层语言仍保存下来,至今仍在使用。海南黎族以前称俚人,《隋书·地理志》载:“俚人犹呼其所尊为倒老也,言讹,故又称都老云。”无独有偶,台湾高山族也保留了同样的语言习惯。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记台湾高山族“呼民人为弥麟”;《隋书·地理志》则记高山族首领“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

明末陈第《东番记》也说高山族首领被称为“大弥勒”，也是一字数音；清代黄叔璥《台湾使槎录》和《台湾府志》等史籍所记“番语”也列举一字数音之例。近人徐松石教授收集、整理了大量案例，如“头”字，台湾土语称“乌颇”，“目”称“麻撒”，“肩”称“歹一八”，“膝”称“希鲁盾”，“足”称“丁丁”，“死”称“马歹”，“水”称“喇淋”，“盐”称“几鲁”，“铁”称“麻里”，“海”称“麻翁”等。而“女婿”称“阿郎”，与广东北江瑶族、广东南部、广西东南部粤方言对女婿的称谓相同^[11]，显示出台湾高山族土语与大陆汉语有渊源关系。虽然黎族、高山族内部有多个分支，但语言的这种共同性没有变化。例如，黎族“古称鸢舌者为南蛮，岐（黎族一支）瑶诸种是也，若充类言之，则吴越无不是也”^[12]。对于高山族，林惠祥教授指出，其语言“各族不同，一族之中复再岐分，故其种类甚多”^[13]。现则分为泰雅、排湾、卑南、达悟、赛夏、布农、鲁凯、阿美、邵、邹族等10个分支。上述吴越有南蛮使用的语言，两地皆为古越人居地，即使用古越语。古越语至今仍残存于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和民系语言中。例如，黎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与同一语族之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等有亲缘关系，但它们皆源于古越语。高山族语言既与古越语相通，当然是从大陆传过去的。

2. 断发文身、凿齿习俗

大陆古越人有断发、文身、凿齿习俗，这类记载和实例甚多。文身具有多种文化意义，其中作为热带丛林中的保护色，是适应地理环境的一种方式。黎族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都有断发文身习惯或残余。海南在先秦古籍中被称为“雕题国”、“儋耳国”，意即文身和戴大耳环。东汉杨孚《异物志》说：“儋耳夷，生则镂其头皮，尾相连并，镂其耳匡为数行，与颊相连，状如鸡腹，下垂肩上。”到了宋代，更多文献记载黎人文身风俗，乐史《太平寰宇记》儋州条云：“尚文身，富豪多文，贫贱少文，但看文字多少以别贵贱。”琼州也一样，“女人文颌，穿耳垂环”^[14]，明顾宪成《海槎余录》记“黎族男女周岁即文其身”。刘咸教授1924年在海南调查，黎族文身仅在面部和胸部的图案就有37式，在手臂有14式，在腿部有13式，共64式^[15]，现仍在黎族一些老年妇女中残存，如笔者在保亭、乐东等地所见。凿齿也广见于大陆和海南，《淮南子》说：“凡海外三十六国，自西南至东南方，有凿齿民。”《太平寰宇记》记载广西贵县俚人女子出嫁，必先折去两个牙齿，以免妨碍夫家。海南亦为俚人居地，这无疑是古越人遗风。

台湾旧称夷洲或流求，三国沈莹《临海水土志》记岛上“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女以嫁皆缺去前上一齿”。与汉人不同，与古越人断发相似。《隋书·流求国传》则说岛上“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毛之处皆亦除去。妇人

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妇女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织斗镂皮并杂色纒及杂毛为衣，形制不一。”明陈第《东番记》也说岛上“男子剪发，留数寸，披垂”。清黄叔瓚《台湾使槎录》云：“水沙连北港女将嫁时，两颐用针刺如网巾纹，名刺嘴箍，不刺则不嫁。”1948年，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曾昭璇教授在台湾考察，见岛北泰雅族盛行文身，男子文额，女子文面，被称为“乌鸦嘴”，南部各支文身亦相类。此俗长盛不衰，以致男子喜少恶老，头白也不留胡子，有一根胡子也要拔除，一些人外出喜欢携带拔胡子工具。台湾土著，如徐松石教授指出：“有好些地方，尤其是多罗国社（新营番社），男女成婚后，各折去上面两个牙齿，彼此交换谨藏，以表示终身不变。”^[16]与上述俚人风俗相类。断发、文身、凿齿虽非黎族、高山族所独有，我国南方、东南亚、日本南部、南太平洋岛国都流行过此俗，但海南、台湾两族文饰及其文化内涵相同或相类，包括龙蛇、花草、树木、鸟兽等图腾或其他标记，显示他们有着共同原始宗教和原始艺术，这显然是民族渊源和文化特色共同性的表现。

3. 崇拜龙蛇等图腾

古越族以龙蛇为主要图腾，崇拜有加，这见于大量史籍、传说和各类建筑、艺术品等。上述黎族、高山族文身图案即反映了这种图腾文化。龙神庙或蛇神庙遍布岭南各地，仅广东德庆县盛时就有300多座，其中悦城龙母祖庙香火最旺。古越人流徙各地，龙蛇图腾即作为文化转移在当地传播。海南黎族流行蛇祖传说，清陆次云《峒溪纤志》云：“相传太古之时，雷摄一卵至山中，遂生一女，岁久有交趾蛮过海采香，与之相合，遂生之女，是为黎人之祖。”类似记载不胜枚举，有些地方黎族至今仍保持禁吃蛇肉的习俗。黎族一支——美孚黎文身花纹似蚺蛇，故被称为“蚺蛇美孚”。黎族中广为流传“蛇女婿”、“蚺蛇青年”等人蛇婚配故事，清楚显示黎族龙蛇崇拜的文化内涵。

台湾高山族也以龙蛇图腾崇拜至为突出，龙蛇在文身图案中居最显要地位。《隋书·地理志》记高山族“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明张燮《东西洋考》说鸡笼（基隆）、淡水一带高山族“手足刺纹为华美”。此风习传承至高山族各分支。泰雅人文身花纹模仿蛇斑纹，排湾人以百步蛇三角纹为文饰，并自称为蛇的子孙，建筑物和生活器具杯、桶之类皆雕上蛇纹，过去甚至在酋长家里备一小房，作为蛇栖息之室，视蛇为保护神。在台湾历史文献中所记习俗，常见“虫蛇”、“鸟翼”等描写与以蛇祖崇拜有关的神话，如邹族、泰雅族、鲁凯族、排湾族等即有不少人蛇婚配的神话和传说，实为高山族原始文化的折射。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旧为闽越人居地，对龙蛇崇拜尤甚。许慎《说文解字》云：“闽，东南越，蛇种也。”台湾多闽潮移民，龙蛇崇拜传入台湾，与高山族龙蛇崇拜相互影响，更加剧了此风习盛行。

此外,无论是黎族还是高山族都相信万物有灵,故日月星辰、风云雷雨、山林川泽、树木五谷等都被赋予某种神灵,受到崇拜,这是他们本根文化相同或相近的明证。

4. 自由结合婚俗

婚姻形态在风俗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异同也反映了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古越人婚姻形式异于汉人,虽也经历了群婚向对偶婚,至其后人向一夫一妻制的转变,但这个进程毕竟比汉人晚,此前有较多性自由和自由结合婚俗或残余。后世黎族“不落夫家”、一夫多妻、早婚、“放寮”、男大女小等风俗盛行,皆为古越人婚俗的传承与变异。明末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广东条引旧志云:黎人“男女未配合者,随意所通,交唱黎歌,即为婚姻”。而台湾高山族也一秉古越人婚俗。沈莹《临海水土志》记高山族“又甲家有女,乙家有男,仍委父母,往就之居,与作夫妻,同牢而食”。“或男女相悦,便相匹配。”到17世纪陈第《东番记》说平埔人牵手成婚,“宵来晨去”。18世纪才发展到男子“夜宿妇家,日归其父合作者”^[17]。“夫妇间财,乏共有之例,为夫者不担任扶养其妻;为妻者如旧与其一族耕种田园,自食己力。”^[18]为典型不落夫家习俗。又高山族也盛行与黎族一样的“入赘”制度,“既婚,女赴男家洒扫屋舍三日,名曰‘乌合’,此后男归女家,同耕并作,以偕终身”^[19]。此外,在离婚、再婚等关系上,高山族与黎族一样享有较大自由,表现了共同的文化特质。

5. 尚武强悍民风

古代海南和台湾生态环境恶劣,毒蛇猛兽横行,瘴疠充斥,疾病为患,人类生存困难,势必引起部族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此也造就了黎族和高山族尚武的强悍民风。其实这也是古越人民性之一。许多文献都说“越人之俗,好相攻击”,直到中原文化传入,“粤(越)人相攻击之俗益止”^[20]。但这作为一种民性,仍随古越人南迁带到岛上。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说黎人“平日执靶刀长鞘,多以竹为弦,荷长枪,跬步不舍去”^[21]。明代,黎族中“生岐……弓矢不释手,虽父子,动辄持刀相加”^[22]。此实为古代许多民族“血族复仇制”的表现,宋人著作《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诸蕃志》等都有类似记载,如《岭外代答·外国上·海外黎蛮》:“性好仇杀,谓之作拗,遇亲戚之仇,即械系之,要牛、酒、银瓶,谓之赎命。”此风也盛行于台湾高山族,《临海水土志》说夷洲(台湾)“其王,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丫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对立”。“国人好相攻击,人皆骁健善走,难而不耐创。诸洞各为部落,不相救助。”到明末,据陈第《东番记》,其人“喜斗而易动,疾战而轻解。起则两社相攻,休则亲戚不仇”。这种强悍

的民风，又集中表现在台湾土著猎头风习上。《临海水土志》记：“得人头，砍去脑，驳其面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作以鬓眉发编，具齿以作口，自临战斗时用之，如假面状。此是夷王所服。战得头，着首还。于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多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直到近世，此风仍有残余。虽然类似记载也见于其他地区的少数民族，但海南、台湾因为是海岛，外来文化传播比大陆相对要迟，所以其民性变化也相对滞后。后世黎族、高山族对外来势力入侵的反抗至为激烈，绝非偶然，正是古越人民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张扬。

6. 嗜食槟榔

我国南方古为瘴疠之地。槟榔含多种生物碱，有消谷、逐水、除痰、灭菌等功效，与南方湿热地理环境相适应，故为古越人嗜好，且世代不衰。唐刘恂《岭表录异》明确指出，“不食此无以怯其瘴疠”。此后槟榔又成为礼品，文化内涵有所扩大。古越人迁入海南、台湾，那里的瘴疠比大陆更为严重，故食槟榔之风有增无减，实为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有其深层的文化根源，而不仅是个人嗜好。唐宋以来，文献典籍多记海南盛产和嗜食槟榔风俗。宋人王象之指出，“琼人以槟榔为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万也”^[23]。“漫山悉槟榔。”^[24]唐宋时期黎人是海南主体居民，也是岛上槟榔最大的消费者。这个地位一直保持至今。

高山族嗜食槟榔的历史已很久远。民族学者徐松石指出，台湾“土著人民喜欢嚼食槟榔，他们往往拿扶萎叶和蛎灰一同咀嚼”^[25]。食用方式与黎族完全相同。现今台湾榔槟漫山遍野，消费量甚大，甚至从东南亚进口。这绝不是偶然的，乃高山族槟榔文化的传承和扩大。此外，两族喜欢饮酒唱歌、喜食酢制食物等习惯如出一辙，充分证明他们为适应相类地理环境而形成共同的饮食习惯。

由于民俗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且是一个民族文化特质的重要表现，故它们的异同成为追踪民族来源的一个主要方向。徐松石教授将《台湾府志》所列的100条特殊风俗与印尼、马来半岛马来人的特殊风俗比较，其中相同的只有18条。又拿这100条风俗与中国大陆苗、瑶、俚（僚）、侗等民族的风俗作比较，其中相同的有83条（按：俚族含后来黎族）。据此，徐教授认为：“可见在风俗方面，台湾土著与马来人接近程度是18%，而他们与南中国土著民族接近的程度却为83%。这情形一方面证明台湾土人祖先大部分来自中国，而非来自印度尼西亚”^[26]。黎族先人既来自中国大陆南方，与主要来自中国南方大陆的台湾土著具有共同来源，至少在民俗文化层面上说明两族的这一特征。

四、共同地名文化渊源

地名作为一种可视和可悟文化景观，其命名与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和民族迁移有关，并且地名历史比文字还要久远，透过地名可了解很多历史文化现象。

黎族作为古越族一支，进入海南以后按古越语命名的地名颇多，现称为“黎语地名”。故明末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指出：“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名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过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地黎称洞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横大，陀横小之类，有四字者……”这种通名在前、专名在后的地名称齐头式地名，与汉语地名命名方式相反。在海南黎区，主要有抱（保、宝、报、包）番、什、毛、那、南（滴）等为起首的地名，约1 000个以上。在广东、广西也不乏这类地名，这已成为黎族源于古越人，从大陆南迁上岛的有力凭证^[27]。

台湾现今地名有一部分是番语，即按高山族人读音用汉字书写的。高山族语言既为胶着语，其命名方式、构词法和含义属古越语，应当为古越人迁入台湾在地名上的佐证。只是台湾经过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和日本侵占，汉人也大规模迁入，番语地名发生很大变化，保留至今且成为台湾地名的寥寥无几，但仍可借助于地名对比分析，看出高山族来源及其与黎族的关系。

埔，谐音有步、埗、埗、埠、甫等，意为平地、津渡、码头之类，为古越语地名。广州有黄埔、增步、盐步、官禄埗，四会有华埗、罗埗、鹿埗等。台湾有埠头、埠子头、后埠、老埠、新埠、埠塘等，部分为齐头式，部分前语素为汉语修饰语，应是汉人到来对番语地名改造所致。

圳，粤方言指水沟。广东有深圳，广州有圳口，南海有梅圳，三水有圳东，德庆有圳边，封开有圳田、圳竹等。台湾有圳寮、圳头、横圳、深圳、过圳、圳岸、圳堵等。这不是偶然凑巧，粤方言（广州话）由古越语融合汉语等而成，台湾“圳”字地名亦应与古越人迁移有关。

南或滴为典型古越语，作为地名与方向无关，意指水。据1982年地名普查，海南有这类地名255个。琼山有南渡江、滴渭溪，定安有南远溪、滴白溪，儋县有南建江，澄迈有滴滚泉，临高有南定讯，陵水有南陵山，东方有南龙江、南浪村，以及南圣、南坤、南罗、南闾、南美、南头、南口、南丰、南阳等，遍及全岛，但以黎区居多。雷州半岛不乏这类地名，如海康即有50个，如南六、南畔、南田等，徐闻有南陈、南上、南洋等，当然个别南字可能指方向，但这并不会改变它主要为古越语的含义^[28]。台湾也保存一些滴字地名，如